

# 陕西药王崇祀风俗 考察记

王宁宇 党荣华 著



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

# 陕西药王崇祀风俗 考察记

王宁宇 党荣华著

学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药王崇拜风俗考察记 / 王宁宇 , 党荣华著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

2010.1

ISBN 978-7-5077-3486-7

I . ①陕… II . ①王… ②党… III . ①孙思邈 (581 ~ 682) - 偶像崇拜 - 风俗习惯 - 研究 - 陕西省 IV . ① K826.2 ② B933 ③ K89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0561 号

出版人 : 孟 白

责任编辑 : 刘 丰

出版发行 :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079

网 址 : [www.book001.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 [xueyuan@public.bta.net.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 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 : 保定金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1.5

字 数 : 25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0.00 元

## 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总指导 **费孝通**

总指导助理 张荣华

学术指导 王文章 张庆善 刘梦溪

总主编 方李莉

副总主编 任大援 乔建中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盛德 方李莉 朱士光 乔建中 任大援

刘文峰 刘托 李东方 杨秀 邱春林

陈绶祥 赵权利 赵朝洪 郝苏民 顾森

总主编助理 杨秀

学术秘书 付京华

# 总 序

“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是由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组完成的。课题始于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第二年，由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具体牵头执行，并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西部地区各院校的许多学者共同参与。有关“人文资源”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课题立项时提出来的。他指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也就是说，人文资源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就有的。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时，其只能称为遗产，不能称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为资源。

我们对有关西部人文资源课题研究的认识是：

一、我国西部的开发应该是一个全方位推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来自各方面人才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但在一般人的眼里，西部开发仅仅是经济的开发，经济的增长率就是最高的追求目标，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人们可能会忽视生态的问题，尤其是处于隐蔽状态的文化生态问题。文化生态的失衡，不仅使文化多样性减少，文化传统消失，人文资源被破坏，还会带来民族矛盾的激化、民族宗教的纷争等严重问题，最终也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集中在西部的10个省、市、自治区，这里是我国文化最多样化的地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大开发也可以说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大开发。在这一过程中，

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在所难免，解析不同民族文化的变迁历史，寻找文化沟通、交流的有效途径，并从中找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生之路，应是课题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

二、西部地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远在约一百万年前，那里就活动着元谋人、蓝田人，在二十多万年前还活动过原始的大荔人，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也都在那里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那里还是黄帝、炎帝的故土，上古时期的中国神话，一直都与这片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曾是农耕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中国经济繁荣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从西周到唐代，曾有十一朝皇帝在这里建都，这里也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最早接受西来文化的地方。早在汉代，这一带就开辟了一条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随后在这条路上传来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各国的文化，这些交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流变。

同时，这一地区又是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地区。各民族世代相传，积累保存了各种文字的大量文献资料，各种民族的口传史记，各种形态的生活民俗、宗教信仰、歌舞音乐、戏曲、绘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研究人类心理、行为、语言和社会结构等诸方面的变迁过程，对于研究宗教和艺术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以及各民族世代相传的原生态文化，都极有价值。

三、西部这些珍贵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需要我们去保护的珍贵财富，同时还是中华民族未来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如何确证我们中华民族自身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在文化上自我肯定，甘愿接受外在文化的文化殖民，就必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焦虑和心理危机，同时导致传统文化的根基遭到动摇。中国改革开放后直到今天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其根正源于此。也正因如此，为了抵御正在形成的单边主义，各国的文化主体性正在觉醒，主张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正在成为一股浪潮，不仅是来自民间，最重要的是各国政府也在积极参与。这和以往的文物保护不一样，文物保护不代表文化的完整性保护，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文化的完整性保护。所谓的文化不仅包括了物质的部分，还包括了一个民族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宇宙观，以及道德准则等非物质部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化遗产就不再只是放在博物馆展览的死的物，而是一种活态的、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建构我们未来政治、文化及经济的资源。从文化遗产到人文资源的研究，不仅包括了以上的政治问题，还包括了经济的问题和文化安全的问题。

如果说在工业文明时期，各个国家争夺的主要自然资源的话，在下一轮的后工业文明时期，各个国家要争夺的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将包括人文资源，今后人文资源是否丰富也将是一个国家国力是否强盛的标志。中国不仅自然资源丰富，生物基因多样，其各个不同地方的传统知识也异常的丰富。这种知识不仅包括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宇宙观，也包括了各种手工技艺、动植物知识、气象知识、中草药知识等，这些是构成未来生态文明社会的基础。这些知识蕴藏在各地的传统民间社会中，是农业文明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中，这些人文资源都是可

以重新认识的无价之宝。它们是否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得到合理的利用和发展，是我们在课题中必须研究和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新塑造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现在在世界范围内，许多民族文化以及各种民间文化呈一种复兴状态，而这种复兴，就是传统文化的复活，但这种复活并不是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在精神层面的。它是作为一种昔日的精神家园给予人们的寄托，让人们在这里看到自己的过去，或领略到不同地域的人文风光，甚至成为一种可以欣赏的活的艺术。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一件文物或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去满足另一种需要”。从功能上来讲，它不再能从制度上物质上去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但它却能从另一个层面，即人们心理需求和审美需求去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能得到发展的根基，也是许多地方文化得以复兴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人类学家所认为的，传统与变迁是对立的、习俗与理性也是对立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正如人类学家萨林斯所认为的，“晚期资本主义”最令人惊叹之处就是：“传统”文化并非必然与资本主义不相容。许多地方正在出现本土化的现代性。但是这种本土化的现代性，如何实现与如何实践，都需要我们去探索和思考。

针对这些内容，课题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西北地区人文资源的全面梳理，从而我们大概知道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有哪些重要的人文资源，其大概的分布及现存状况。这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摸清家底，其既是一种文化的研究记录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的保存方式。为此我们建立了“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第二个部分是对西部不同文化类型区域进行实地考察。人文资源这个词在我们的理论文章里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但当我们将其放在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同时了解到具体承载着这些文化的群体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研究顿时会具体起来，我们会遇到许多在抽象的理论中未曾提出和未曾认识到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做面的梳理的同时，还做了系列的个案研究工作，企图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来找到我们所需要研究的问题所在。当笔者带着问题去请教费孝通先生时，他指出：“解剖麻雀，以小见大，这是人类学里面常用的方法，但要注意，一只麻雀是不能代表所有麻雀的，要多解剖几个，而且要用它们来相互比较。只要我们能科学地解剖这些麻雀，并摆正点与面的位置，恰当处理两者的关系，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点上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出真知，只有到实地中去调查研究，才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的特点，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你们的研究要摆脱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模式，要走出书斋，在实际考察中认识西部、了解西部。”他还说：“围绕着西部的文化变迁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主题，来提出问题，然后通过考察来认识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做法是可行的。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认识往往比从书本上得来的认识具体得多、充实得多。因为它不是从概念中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所以只要能自觉

地、不留情面地把考察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它就会成为西部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的真实记录，即使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当人们来翻看它时，仍然具有价值。”

费孝通先生给我们课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说，我们的课题组成员虽然来自不同的人文学科领域，却能对一个共同的地域文化，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我们不仅有一个共同的研究目标，还有一个共同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到实地去，到田野中去，观察最鲜活的社会事实，捕捉最新的文化重构方式，感受最新的时代发展脉搏。

通过7年多的研究，课题完成了73篇考察报告，并按内容编辑成5本考察集（《关中民间器具与农民生活》、《西部人文资源考察实录》、《西北少数民族仪式考察——傩舞·仪式·萨满·崇拜·变迁》、《陇戛寨人的生活变迁——梭戛生态博物馆研究》、《“呼图克沁”——蒙古族村落仪式表演》），完成了4本考察笔记（《西行风土记——陕西民间艺术田野笔记》、《梭戛日记——一个女人类学家在苗寨的考察》、《陕西药王崇祀风俗考察记》、《西南山地文化考察记》），3本论著（《人文资源法律保护论——以西部人文资源保护为起点的研究》、《西部人文资源论坛文集》、总报告书《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共12本书，400余万字。

7年多来，课题组成员在西部的追踪考察，使我们亲身参与并感受到了西部民间文化的剧烈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缓慢的文化变迁，而是文化在各种内在与外在力量及权力交锋中的重组或重构，在这一过程中，西部的传统文化成为各种力量和权力都在反复利用和开发的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其“资源”意义远远大于或超越其“遗产”意义。因此，从“遗产”到“资源”，不是一种理论研究，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正在进行着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还不能很清楚地辨别其利弊的社会实践。

课题立项不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就开始启动并迅速展开。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步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对我们的课题无疑是重大的促进。因此，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汇入这一保护工程，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话语空间，促使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知道，西部人文资源这样一个课题的研究内容是很广的，以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及人力、物力想完全做好是很困难的。但笔者认为，只要我们努力，每个人都尽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哪怕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一些思路、提供一些研究的线索也是值得的。

另外，课题结束了，我们课题的学术总指导费孝通先生却离开了我们，我们谨以我们勤奋的工作来纪念费先生，来继承他未竟的事业。

方李莉  
2008年夏

# 前 言

西部文化田野笔记可以说是我们课题的一部分成果，也可以说是课题的副产品。说是课题的一部分成果，因为它是课题规划中阶段性成果的一部分；说是课题的副产品，是因为它不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写成的。它们基本是学者们的一些考察笔记与随笔，在体例的要求上也没有严格的一致性，即并不要求是一种纯客观的记录。因为是笔记，在记录事件本身的同时，可以同时存在作者的个人经验、情绪、感觉、直觉、反映、思辨，甚至下意识等。在以往的学术规范中，这些都是在学术写作中需要剔除的、带有情绪化文学色彩的成分。就像马林诺夫斯基在土著部落考察后，贡献给学术界的只是那些经过了整理和理性分析以后的学术报告，但那些在考察过程中的心理感受、情绪的波动与震撼、各种事件经过的细节描写、作者与当地人之间的沟通与情感上的交流等，都只存在于他的日记中，在学术报告中这些丰富的各个断面都遭到了删除，因为这些都是非客观描述的方面。

其实，人文学科的研究很难存在纯粹的客观。许多论述宏大叙事的理论，一方面在追求绝对真理、绝对客观；另一方面，在研究和整理材料时往往把不能与他们讲述的理论相容的维度或细节都统统加以删除。任何一种理论的研究都隐含着某些观念对另一些观念的特权，支持某些视觉和排斥某些视觉。从这一角度来看，由于没有经过理性的分析和整理，笔记里的东西也许会比较杂乱，但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读到学者最原始的感受、最纤细的情感描述。所以，田野笔记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副产品，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课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除了对西部人文资源中包含的以往的文献的整理外，对一些现状的具体专业性的考察。本课题的学者来自不同的专业，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和研究的目标，那就是西部的人文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的内容太多，学者们只能从各个不同的专业和地区去各个击破，因此在课题的最终成果中，每个学者的研究都被限定在严格的专业研究的范围内，所撰写的内容是不能超出专业范围的。但当我们具体下去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文化现象并不只包括在某一专业

的视野中，它的丰富性及与各个学科的密切联系性，是很难用纯专业的理论将其描绘或表述出来的。因此，在许多专业的学者的考察报告中，他们所观察到的文化事实早已超出专业的范围，而且也很难将其考察纳入到纯专业的范围中。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考察笔记、考察日志，不仅包括了对事实的记录，还包括了学者本人的心路历程以及个体体验，都是非常珍贵的对西部文化田野现场的记述和理解，整理和出版出来将会是经得起任何时间考验的历史记录。

就像本系列考察笔记的作者王宁宇先生，他的专业是研究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的，他考察陕西药王崇祀最早是被“药王崇祀”中“花馍”的制作所吸引而去的，因为这是民间美术的部分。但在其考察中，整个的学术视野便被开拓到了一个整体的文化空间中。感动他的不仅是民间美术，还有那些产生在民间生活中巨大传统力量的延续精神。在那里，他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社”与“会”。他看到的是，陕北乡村没有关中地区普遍存在着的“社”，而这些星罗棋布的以乡村小庙为支点的“会”，乃是与关中的“社”作用大体相当的，是凝聚和建构民间力量及民间宗族制度的极为重要的方式。作为仪式中最重要的道具——“楼轿”，是神灵代步的肩舆（轿），更是神庙的符号象征，是不可移动的建筑与群众具体生活空间一种能动的媒体。围绕它的形制打造、装饰手法、保管接请以及出行、处理诸相关事项的原则、仪程、禁忌，蔓生出方方面面的习俗或制度。楼轿本身成为一种复杂的文化载体，映射出乡村历史与社会、审美与信仰、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变故和进程。作者被他的考察对象所吸引，采访了仪式中的不同角色和不同的组织者，写下了大量的考察笔记。在往返不断的考察中，他记录下了近十几年陕北药王崇祀的变迁过程，也包括了他对当地农民心理变化过程的描述。在他的笔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丰富的、多角度的，而且充满着生机的陕北民间文化。

在潘年英的笔记中我们更看到了一个生动的、从个人经验出发的、对西南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描述。作者不像学者，倒像一个讲故事的人。读他的笔记让我们想起美国学者乔治瑞泽尔所说的，对后现代主义者而言，社会理论家就是一些讲故事的人，这就有助于摘去罩在理论家头上的神秘光环，消除他们的活动与那些外行人的活动之间的区别。毕竟，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讲故事的人。在潘年英笔下的“冲傩还愿”活动，苗族“茅人节”、牯脏节等不同民族的节日仪式，都与生殖或生命有关。在今天，这些民族的这些节日仍然存在，但原有的意义已经被冲淡，更多的是倾向于为地方经济发展做点贡献。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醉翁之意已不在酒。经济的转型，文化的变迁，在作者充满着矛盾情感的笔下，不断向我们展现。包括挪威政府在贵州梭戛建的“生态博物馆”，“欧洲经验”和中国国情之间的矛盾，作者没有用学术的理性分析来向我们讲述他的观点，而是通过具体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民间文化保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巨大矛盾。

在方李莉的两本考察笔记中，第一本《西行风土记》，我们随着她的足迹深入到陕北的沟沟峁峁、山山梁梁。在课题中方李莉是牵头人，但从她的专业角度来看，她的本意是多做民间工艺或民间美术的考察。因为人们常说艺多不精，所以在考察中她也试图将视点聚焦在一个点上，但下去以后她发现，在学者的研究中，我们把所有的

专业都分得清清楚楚，但在民间文化中，所有的专业都是纠缠在一起几乎难以分离的文化团块。她下去后从来不住饭店，都是住在某一民间艺人或工匠窑洞里，甚至和秧歌队员们一起走村串乡，一起滚在农民的大炕上。在考察中她发现，这些民间的艺人和工匠们，他们是生活在具体的文化空间中。他们所从事的手艺及艺术，与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周围的人和事，甚至与他们的生产方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不能观察这一切，我们就很难解释他们的艺术行为。尤其是民间的这些草根艺术，它们本身就是与艺人们的文化甚至历史连成一片的。如果我们将其单独地剥离出来，它们就成为了一种没有生命仅供解剖的标本。因此，她的笔记早已超出了事先所限定的范围。在她的笔记中，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脉搏在涌动的历史洪流中急剧的变化，也感受到了艺术在民间文化中的价值与意义。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当今西部民间文化在“资本逻辑”、“市场经济”发展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各种“权力”和“权威”形成的力量正在重构一个新的民间文化的空间，民间艺术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本《梭戛日记》是作者和课题组成员们一起在梭戛生态博物馆做考察时写下的日记，在日记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在考察中如何亲历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剧烈的变迁与重构的过程，也看到了她在考察过程中所面对的种种复杂心理矛盾。她不断地考察不断地质询，通过她的讲述我们看到，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那么简单，并不是仅仅用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就能解决的，这不是一个工程，更不是一种技术化的问题，民众的生存需求与情感向往比我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要具体得多，也要生动得多。

在这些笔记中，由于每个人的专业不一样，所关注的视野和角度都有所不同，而且各自的文风也都不一样，但其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关注的是同一块土地上的文化，这就是我们课题所要研究的西部文化的田野。他们的考察笔记为课题总体报告书撰写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在总体报告书中我们将删去他们撰写的所有细节，而抽出其中对报告书有用的资料，以证明我们的假设与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描述中，很可能会遮蔽笔记中的许多非线性直觉，以及丰富的个人情感的表达。幸好我们出版了这套笔记，让人们看到了考查资料最原初的面貌。

丛书编委会

# II 求

<b>阿寿药王会采访记 .....</b>	<b>1</b>
一、采访缘起 .....	1
二、初访阿寿 .....	2
三、序幕：串村观花 .....	6
四、不平静的一夜 .....	15
五、赛花显手段 .....	21
六、花苦鼓和骡车鼓 .....	26
七、自乐班·祈福花·司值妇 .....	31
八、余话：社火和接水 .....	35
<b>耀县药王山庙会追踪记 .....</b>	<b>39</b>
一、总叙 .....	39
二、法水 .....	40
三、前山 .....	42
四、显化台磴道 .....	44
五、大殿 .....	45
六、取药与开锁 .....	46
七、道士 .....	47
八、生机 .....	48
九、坐虎针龙 .....	50
十、源与流 .....	52

# 目 求

十一、神思寄山河 .....	55
附录 新建集躉宫记 .....	61
<b>太白药王崇祀调查记 .....</b>	<b>63</b>
一、奔往大山 .....	63
二、太白第一宿 .....	65
三、飞雪走桃川 .....	68
四、看乡村医生制药 .....	71
五、咱是药王弟子 .....	72
六、一幅药王画像的故事 .....	75
七、寻经赶会到枣园 .....	77
八、药枣村的感恩节 .....	80
九、文武两全颤法师 .....	83
十、见证过历史的老会长 .....	87
十一、传奇郎中奋斗史 .....	89
十二、草药活书知识源 .....	91
十三、老革命药王情结 .....	94
十四、一个挖药农民的忧世心 .....	97
十五、五月，鸟鸣山更幽 .....	100
十六、霖雨八月奔靖口 .....	105
附录一 药王咒 .....	112
附录二 药王本愿妙经 .....	113
<b>药王楼桥与安塞、延安老醮会 .....</b>	<b>122</b>
一、1992年正月，邂逅安塞药王神楼 .....	122
二、2004年10月3日，下李家沟娘娘庙 .....	124
三、10月4日上午，碰头在冯家营 .....	127
四、10月4日下午，下李家沟的座谈会 .....	130
五、10月5日上午，沙渠湾的村卫生室 .....	133
六、范家沟，老会长话说云台山 .....	135
七、10月5日下午，云台山上好观光 .....	138
八、10月6日、7日上午，郭家峁听口述史 .....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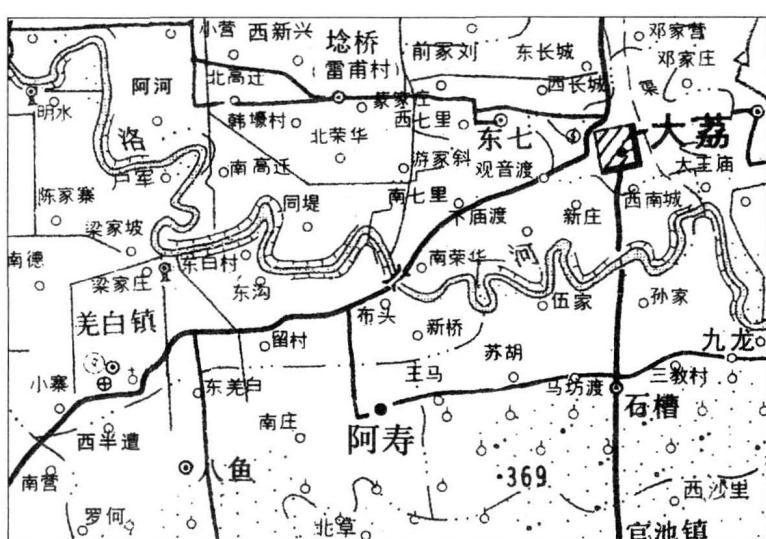
九、10月6日、7日下午，探秘阎岔村	146
十、为老醮会服务的木匠、画匠和铁匠	149
十一、10月8日、9日，延安第七会的庙和楼轿	151
十二、10月9日，两位跨角色的访谈对象	155
十三、回顾与思考	158
后记	164

# 阿寿药王会采访记

## 一、采访缘起

阿寿是陕西省大荔县的一个普通村落，位置在县城西南方向大约20来里路程的地方。从历史上说，大荔一直是关中平原东部的重要城市，过去曾长期设州，称为“同州”，后来又曾作为府治所在地，习称“同州府”、“东府”，辖朝邑、澄城、合阳、韩城、蒲城、大荔等县，长期为关中东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其传统文化之繁荣发达，在秦、晋一带是颇有声誉的。滔滔黄河在县境东边由北向南倾泻，隔河东眺是山西省的永济、芮城二县。

滚滚洛河从陕北高原上流下关中平原，自西北方向进入大荔，在县境内画出一个“S”形，由东南注入渭水。渭水则横亘于整个县境以南，纳洛河东流20多里即归于黄河；渭河以南为华县、华阴县境。这样，恰好在洛河与渭水交汇地带形成一个面积数百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苑”所在地（当地人俗称“沙窝子”）。因为此地水草丰茂且地势广阔，不利定居农耕而有利于放牧马匹，所以从隋唐到明代初年一直被划为皇家养



阿寿村地理位置略图

马的基地。我们要访问的阿寿村，就处在洛河南岸距河两三里路的位置，正好是古代沙苑的北部边缘。

自 20 世纪中叶沿渭河南岸的公路和铁路先后筑通以来，大荔县逐渐失去了昔日关中东部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中心的优势，但是论起民间文化艺术的渊源来，却是蕴藏相当丰富和深厚。我们对阿寿村的注意，就是 1989 年夏末在大荔县参观该县文化艺术节的民间美术汇展所引发的。

到达大荔县城，是当年 8 月 28 日中午。车子径直驶进了县文化馆大院。大荔县民间美术展览设在文化馆临街的大楼里，楼上楼下共占了四个展室。展品很丰富，有窗花剪纸、服饰刺绣、童鞋花帽、纸扎泥塑和喜庆花馍、农民画等许多类近千件，而其中最引人兴味的还是这次展览的主体展品——八鱼乡阿寿村妇女们用麦面粉蒸制成的一套敬祀药王爷孙思邈<sup>[1]</sup>的大型献礼馍——那是从万人伞、守门虎、旗杆到牌楼、戏楼、山门、正殿、上殿、药王山、药王洞等通通包括在内的该村旧时药王庙建筑与设施的模型，摆在几条长书桌连拼起来的展台上。县文化馆干部告诉我们：大荔县农村的花花儿馍一年到头是不断的，四时八节、生日寿庆、红白大事都要蒸花馍，既是礼仪，又是食品，既“行门户”沟通感情，又显示妇女的心智手艺。这话不假，展室里陈列的花馍确实样式十分繁多，有不少精彩动人的作品，颇值得流连揣摩。跟我多年来在陕西各地乡村所看到的花馍相比，阿寿这套专为二月二祭祀药王而献礼的花馍，无论从主题的特殊纪念意义还是构成形式的复杂庞大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考察拴马石雕刻艺术遗存时恰巧没在那个村深入调查，所以并不知道当地民间这一项特殊乡俗美术，透露这个信息的是渭南地区群众艺术馆资深美术干部范源远。原来阿寿村做这种花馍献食的习俗，早在 60 年代初就被“打倒”，到近几年才在群众中悄然复生。范源远发现后极力支持，并策划把这组花馍列入今年县艺术节的展出项目，于是县文化馆出面，并指派年轻的美术干部丁竹燕蹲点该村负责，这才使它得以堂而皇之地展出在县城里。

我们来得晚了些，这组花馍已展览了一两个月。在村子里做成，辗转运到县里，搬来搬去地布置，加上天热干燥，损失了不少新鲜艳丽气息，部件有开裂脱落处，也积了些难以拂净的尘灰，但它全部构成组合的完整气势、布局之严整、规模之宏伟，实在是乡间农妇手工艺作品中罕见的巨制。诚如小丁所感叹的——她们是怎样想出“用面盖起来大庙”这种绝妙主意的呢？小丁转述当地听到的老百姓传说，当年药王孙思邈路过阿寿村，恰逢这里瘟疫流行，药王采沙苑草药为百姓治病疗疾，百姓感恩戴德，全村人共同为他建庙，并形成了制作花馍献食的风俗。这里面一定有值得挖掘的东西，而且既然见到了实物，就觉得确有必要到这些实物所产生的环境中察看一下。说走就走，当天下午我们就在县文化馆几位同志陪伴下驱车上路了。

## 二、初访阿寿

西出县城，车子先沿公路向西南行驶约 8 公里，过洛河桥再走一截便折往正南，上了颠簸不平的乡级便道。车速一下子降了下来，摇摇晃晃地走了将近 4 公里吧，道

路向东拐弯，前面来到一个地方很大的村子，阿寿到了。

东西走向的乡级便道穿村而过，在村内这段路面加宽、路两旁挖有排水沟、新栽的桐树，沿路建的住房鳞次栉比，形成全村新的主干。事先没跟村里联系，这会儿太阳尚未西沉，外出干活儿的都还没归家，县上的同志忙着分头四下找人，我们也不便独自走远，只在附近稍事转悠。还是小丁行，首先找来了村妇女主任。妇女主任姓马，厚宽的身板，红润的脸膛，一望而知是位热诚、泼辣、能干的角儿。马主任立刻开锁开门，把我们这一大群让进她家，沏茶、递烟、安顿好，才又一阵风踅出院子。不久，她领来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书记是个瘦瘦的青年，面对这么一班子省城和县上来的人有点局促不安，又有点兴奋意外。他坦诚地作自我介绍，说自己年轻，对本村历史悠久的“面食”了解不够、支持不够，通过搞艺术节，经村领导商量把二月二面食活动大胆交给妇女主任来组织，结果确实叫人大开眼界，提高了积极性。年轻书记的组织能力还是很强的，安排我们一行人喝罢汤，<sup>[2]</sup>接到临时通知的村老乡贤们就陆续到来了。就在书记家里，一个简短而热闹的调查座谈会开始了。满屋子朴朴实实的老者们显然都因这次突如其来的聚会而高兴和自豪，在蜡黄的电灯光和烟草雾气交织成的帷幕下，大家纷纷打开了话匣子。下面把发言记录直接摘抄几页吧：

**书记：**今年（农历）二月二，方圆百里的老乡聚集此地纪念孙思邈先生。我原是一名教师，多年教书哩，对民俗习惯了解不够；当支书三年了，过去（对献花馍）不支持、不反对，从今年二月二古会新起点开始，开阔了眼界。地区群艺馆范源远等上级领导和爱好者来了不少，评价很高，认为是传统的优秀艺术。本村共有3200口人，分为9个居民小组。群众中还夹杂着一些迷信思想，烧香、磕头……

**妇女主任：**（19）85、（19）86那两年你根本纪念不成。照群众话说，孙思邈灵应得太太！<sup>[3]</sup>过去上头老压住不叫蒸（花献食）馍，群众总是偷偷儿就给蒸上了；各社（从群众中）收各社的面（阿寿过去共有东、西、南、北四个社，是传统庙会活动之社，不是50年代以后建立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或人民公社之社），干部知道就来给你掀了、没收了。1988年，是群众自愿组织的，热（心）家寻队长（要求得到准许）。农民心理上都（认为）那灵验得太，多年没娃娃的，到斡搭<sup>[4]</sup>磕个头就会有娃娃了。结果闹起来形势大得太太，探马、摩托车（社火队伍的联络员），（献礼队伍）摆了几里路呢，一搞事情给焯赫<sup>[5]</sup>咧！今年，新村长对这有点热，各社搭（凑份子集资）下这香钱，立下会、出告示、推举负责人，四社分担。蒸馍的面是自发收集下的，有家出一两碗的，有家出到几十斤的，不等。还有车、马，（人们认为）借谁家的马时谁要是不给，他的马就不得好。还有人送下斡匾。还有人来拔花——有人糊下斡纸花送会上叫人拔，连华县唱戏的也在咱这儿拔呢——（拔花人）第二年可还愿呢，拿一把把花来，（看庙的）老婆婆们搁斡儿又叫（别的祈的）人拔哩。只要说是纪念孙思邈，人们自觉得太太，干事快得太太。这回为艺术节为你们（对县文化馆来人）寻斡一套时，人都追着问（意欲参加）呢。群众自备砖料，自动（义务）出工去修庙墙；药王像是手艺人自己动手雕塑，在炕上炕干的……